

助力城市规划学科的现代化奠基： 东德专家雷台尔在中国（1957— 1958年）*

Laying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Urban Planning as a Discipline:
East German Expert Hermann Räder in China (1957—1958)

李浩 吴梦迪 张琪

LI Hao, WU Mengdi, ZHANG Qi

关键词 城市规划史；城市规划教育；
规划知识转移；德国；城市建设史；城
市规划原理

Keywords: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urban planning education; transfer of
planning knowledge; Germany; history
of urban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of ur-
ban planning

提 要 东德专家赫尔曼·雷台尔（Hermann Räder）1957—1958年在同济大学的讲学活动是中国城市规划学科早期现代化建构进程中一段极具价值的国际规划知识转移实践。在德国魏玛大学档案馆等档案机构查阅一大批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对雷台尔来华讲学的缘起、讲学内容与学术影响等进行了系统梳理。雷台尔的讲学虽以高校为依托，但其影响却远超教学范畴：通过引入深厚的历史、理论与科学方法论，雷台尔不仅深刻影响和塑造了董鉴泓、阮仪三和耿毓修等中国城市规划学者的学术路径，更以上海、合肥等城市的实践为切入点，推动形成了融合国际经验与地方实际的“合肥模式”，从而在中国城市规划学科的现代化与本土化进程中留下深远印记。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外城市规划专家的讲学和交流，并非简单的单向知识传输，而是一个典型的“双向赋能”过程，呈现出一种双重的、交互式的影响机制。

Abstract: The lecture series delivered by East German expert Hermann Räder at Tongji University in 1957—1958 represents a valuable case of international planning knowledge transfer in the early modernization of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Drawing on extensive primary sources at the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Weimar and other archival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origins, content, and academic impact of Räder's lectures in China. Although Räder's lectures were delivered at universities, their influence extended well beyond the realm of teaching. By introducing rigorous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scientific methodologies, Räder profoundly shaped the academic paths of Chinese urban planning scholars such as Dong Jianhong, Ruan Yisan, and Geng Yuxiu. Moreover, using the planning practices of cities like Shanghai and Hefei as entry points, his lectures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Hefei Model", which integrate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with local realities. This left a lasting imprint on the modern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The engagements of foreign urban planning expert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re not a simple one-way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but rather a process of "two-way empowerment", exhibiting a dual and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influence.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6361/j.upf.202601015
文章编号 1000-3363(2026)01-0110-10

作者简介

李浩，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jianzu50@163.com

吴梦迪，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琪，UNO 织城网络策展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规划遗产理论及其保护利用方法研究——以北京为实证对象”（批准号：5217802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城市建设思想文献挖掘、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9ZDA014）；北京建筑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城市规划视角下北京红色文化遗产价值评估与保护利用研究”（项目编号：PG2025020）

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在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征程中具有独特而卓越的贡献，积极引领着中国城市发展的现代化进程^[1]。作为中国第一所创办城市规划专业的院校，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育始终着眼国家发展未来，放眼全球理论动态，形成代际传承的创新群落和兼收并蓄的国际氛围，是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发展史的缩影^[2]。同济大学在创办早期由德国教师授课，并采用德国学制、德文教材和德语教学，具有浓郁的德国色彩。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时，华东地区十几所院校的土建系科集中到同济大学，不仅大大加强了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和建筑学教育的师资力量，也塑造了其多元思想汇聚、流派纷呈的学术风格，更深刻推动其从德国教学模式向立足于中国国情的本土化模式转型^[3]。不仅如此，随着城市规划专业正式创设，城市规划教育快速发展，专业内涵逐渐清晰，专业基础不断夯实，为改革开放后城市规划的迅猛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4]。

1952—1959年作为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育的夯实期和起飞阶段，恰逢中国大规模城市建设的蓬勃展开，城市规划教育与城市规划实践得以密切结合，实现产学研的一体化发展。在这一时期，同济的城市规划教育不仅有毕业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中国学者和知名专家的全面参与，还有来自苏联和东德等国的一些外国同行专家前来讲学，极大丰富了城市规划教育的思想和文化。东德专家雷台尔的讲学活动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城市规划前辈董鉴泓和阮仪三等曾多次回忆过他来同济大学讲学的情况。雷台尔讲授的两门课程《城市规划原理》和《欧洲城市建设史》，对同济大学的城市规划学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尽管雷台尔受聘在同济大学，但他的援助工作并不局限于城市规划教育方面，而是对上海、合肥等地的城市规划建设也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如此重要的一位国外城市规划专家，其来华技术援助的许多具体情况却并不清晰：雷台尔为什么会来华？他的教育背景和生平经历如何？有何规划思想和主张？关于他来华的时间为什么会有1956年^[5-6]、1957年^[7]和1958年^[8]等各种不同说法？他在中国究竟工作了多长时间？对中国城市规划

学科有何影响？近年来，在笔者从事城市规划史研究和对城市规划前辈访谈的过程中，以及本文第三作者赴国外留学^[9]的过程中，陆续搜集到关于雷台尔的许多珍贵史料，其在华讲学活动的历史画面逐渐清晰起来。特此撰写本文，期望对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史和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育史的研究有所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雷台尔来华讲学的历史考察可以从两个层面着手：一是就若干基本史实进行梳理，进而对其多方面的价值与影响加以分析和评价；二是从规划思想史的高度，探讨雷台尔的讲学对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理念的深远影响，从知识史的角度分析城市规划知识在中德之间的传播以及中国的在地化过程。显然，前者的史实考证是后者史学评论的必要的基础和前提。本文主要定位于前者。关于后者拟另外撰文讨论。

1 东德专家雷台尔来华讲学的缘起

东德专家雷台尔之所以来华讲学，主要是由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科建设以及当时的国际文化交流机制促成的。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同济大学在原土木系的基础上融汇其他多所院校的师资力量组建成立建筑系，在全国率先创办“都市建筑与经营”^①专业（城市规划专业的前身），1956年报请教育部批准正式以“城市规划”专业名称进行招生^[10]，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科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在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时代背景下，同济大学建筑系申请派遣苏联城市规划专家支援城市规划学科建设，后教育部派遣苏联专家都拉也夫（А. Я. Тулаев）到同济大学，冯纪忠和金经昌负责接待，结果“发现专业不对口，没有共同语言，原来他们派的城建专家是道路工程方面的”^[11]。在此背景下，同济大学研究决定成立城市建设系，由董鉴泓任党总支书记，并决定由建筑系另外打报告，申请邀请东德的城市规划专家前来同济大学讲学^[11]。

同济大学建筑系之所以申请东德专家前来讲学，首先是源于同济大学的办学与德国有着深厚的渊源。其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

阵营的多个国家保持着密切的互访交流机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纳粹德国的苏联占领区基础上和在纳粹德国首都柏林的苏联占领区范围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或“东德”）正是其中之一。1956年9—10月，中国建筑学会派遣由副理事长梁思成率领的中国建筑师代表团访问东德^[12]，同济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教研部主任金经昌参加了此次出访活动，途中拍摄了大量照片^[13]。1957年4月28日—5月28日，东德派遣建筑师代表团一行12人来中国进行访问交流^[14]，金经昌在同济大学接待了东德专家并有多张留影^[15]。

作为中国城市规划学科的创办人，金经昌曾于1938—1940年在德国达姆斯塔工业大学学习，毕业后在德国工作至1946年，他对德国的城市规划本就相当熟悉，1956—1957年间中德的学术交流又加深了他对德国城市规划发展和规划教育的深刻认识，着眼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科建设的前瞻性考量，遂萌生邀请德国专家前来讲学的想法。而在德国魏玛大学任教的雷台尔，正是备受金经昌推崇的一位重要学者^②。于是，经金经昌推荐，同济大学建筑系向上级部门提出邀请雷台尔来华讲学的申请。

2 雷台尔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

赫尔曼·雷台尔（Hermann Räder），1917年7月6日出生于德国纽伦堡（Nürnberg），父亲是公务员，家乡在诺德林根（Nördlingen）^③。他最初接受的是泥瓦匠和木匠的职业培训，在完成意大利和法国等国的游学后，1937—1938年在纽伦堡埃伯特建筑师事务所（Büro des Architekten Ebert）工作，并参与了新闻大厦（Presse Hotel）的设计工作和布特伦·拉登（Bunter Laden）贵族宅邸的改造工程。他的建筑学专业的系统学习始于1939年和1940年，先后就读于斯图加特与慕尼黑两所技术大学，1940—1946年在魏玛建筑工程学院学习并取得建筑师文凭。此外，他还于1950—1952年通过函授课程完成了经济科学专业的进修。1957年来华前，雷台尔已在魏玛建筑工程学院担任教授。资料显示，他还曾担任该校区域规划和城市建设研究

所 (Institut Gebietsplanung und Städtebau) 负责人 (图1), 一直任教至1971年退休, 1980年^④在魏玛逝世^[15]。

魏玛建筑工程学院又称魏玛包豪斯大学 (Bauhaus-Universität Weimar), 简称魏玛大学, 其前身是创建于1860年的大公爵萨克森美术学校 (Großherzoglich Sächsische Kunstschule), 1919年随着魏玛共和国的建立, 由该校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和设计师接手而成立, 以德国国立包豪斯 (Staatliches Bauhaus) 为校名, 成为先锋派艺术家们推行现代设计理念的精神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纳粹迫害, 曾一度暂停办学。1940年代恢复办学后, 曾先后采用建筑与造型艺术学院 (Hochschule für Baukunst und Bildende Künste) 和建筑工程学院 (Hochschule für Architektur und Bauwesen) 作为校名, 下设建筑系和美术系等。雷台尔在这所学校获得了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方面的良好教育。

雷台尔是一个颇具设计天赋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 早在1940年代末已完成东德和西德的诸多设计项目, 代表作包括德绍火车站前广场、纽伦堡老城改造项目、科特布斯市政中心、柏林动物园、松德斯豪森剧院广场、埃尔福特政府区、诺德豪森市民活动中心、哈勒/萨勒河畔塔尔曼广场以及东哈尔茨地区的拉普博德水库。他最重要的城市规划作品当属苏尔市恩斯特·台尔曼广场 (Entwurf für den Ernst-Thälmann-Platz) 的设计方案 (1953年)。而由他设计的苏尔市文化中心“十月七日” (Suhler Kulturhaus “7. Oktober”) (1955—1957年)

则以保持国家传统建筑风格而著称 (图2)^[15]。

3 雷台尔对华技术援助工作的经历

关于德国专家雷台尔的来华时间, 相关文献中之所以存在分歧, 原因在于其来华计划发生过变更, 他曾于1957年和1958年两度来华。在德国魏玛大学档案馆, 保存有雷台尔两次访华的大量珍贵档案, 其中, 关于他两次访华情况的总结报告尤其珍贵。1957年的总结报告表明, 雷台尔于1957年5月24日—12月17日访问中国, 他特别感谢冯纪忠和金经昌对他的热情接待, 尤其是金经昌“精湛的翻译为我快速进入工作状态提供了很大帮助”^[16]。在1958年的总结报告中, 雷台尔指出其第一次赴华讲学“中断的原因是我能够将魏玛建筑工程学院1957年和1958年学期的课程集中到春季进行, 因此没有造成太大的课程损失”^[17]。

为了兼顾雷台尔在本国的教学任务, 同济大学于1957年10月29日向高等教育部致函, 提出调整雷台尔讲学时间的申请, 并“建议新聘请的专家能在学期或学年一开始就到校工作”^[18]。12月3日, 高等教育部向同济大学和清华大学下发关于雷台尔及另外一位德国专家援华工作时间调整的批复文件, 文中指出: “你校德国专家雷特[台]尔、斯佩尔的聘期, 根据1957年中德文化协定上规定为一年。现因其国内工作需要, 提出拟于12月底返国的要求。经我部与民主德国驻华使馆会商, 同意该二位专家于12月

份回国, 并分别于1958年4月 (斯佩尔) 和8月 (雷特[台]尔) 来华继续工作”^[19]。

雷台尔第一次讲学结束前, 同济大学校领导和建筑系主任冯纪忠于1957年12月11日分别向其致谢。冯纪忠在感谢信中说: “在过去七个月中, 我系和他系的教师以及其他各建设单位派来的同志们能系统地听到您《城市规划原理》和《[欧洲]城市建设史》的讲课。我系城市规划研究室和上海规划勘测设计院合作的实验住宅区设计, 在进行过程中承您以忘我的精神进行指导。在您暑假旅行中, 又在重庆、成都、武汉和杭州各地, 对规划工作热情地、友谊地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我国高教部已经正式批准, 请您明年八月再回我系讲学五个月”, “在您回来的时候, 希望为我们继续讲《城市规划原理》和《区域规划》, 指导具体规划设计研究工作; 并且希望带来一些魏玛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建筑系的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 在我校举行展览”^[20]。1957年12月13日,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师生到上海机场欢送雷台尔回国。

据雷台尔1958年的总结报告, 他第二次来华是乘坐波兰 M. S. “Stefan Okrzeja” 号货船, 自1958年7月26日启程, 沿途对德国、法国、英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城市进行了考察, 于9月29日抵达广州, 随即参与到江西省的城市规划实践之中, 参与指导了该省5个地区的区域规划以及72个中小城市的规划设计草图工作 (图3)。之后转赴安徽省, 帮助合肥市制定一份城市规划方案。自11月18日起, 他开始继续在同济大学授



图1 东德专家雷台尔与同事一起分析城市规划设计方案 (1960年代)
Fig.1 East German expert Hermann Räder was studying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schemes with his colleagues (1960s)

注: 左图中左2和右图中右1为雷台尔。
资料来源: 德国魏玛大学档案馆



图2 雷台尔的设计作品:
苏尔市文化中心“十月七日”
Fig.2 Räder's design: "October 7th"
at the Suer Cultural Center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15]

课，除了讲授《城市规划原理》外，增加了一个关于区域规划工作的系列讲座。授课期间，他与听课的规划者和学生们就四川、福建、江西、安徽和江苏等地的城市规划实践进行了交流与讨论。1958年底又对安徽省马鞍山钢铁基地的城市规划工作进行了指导，并举办了关于人民公社规划的首次讲座^[17]。另据同济大学于1959年1月1日给雷台尔的致谢信，其工作内容还包括“上海人民广场改建规划、‘七一’‘红旗’‘东方红’等人民公社的规划以及其他各城市的规划工作”，此外“还主持组织了威[魏]玛土建学院城市规划专业学生的展览会，并将全部展览图片送给我校，提供给我们许多教学资料^[21]。”

雷台尔第二次访华结束前，同济大学师生及有关单位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其技术援助工作表达了由衷的感谢（图4）。1959年1月1日，同济大学校长在庆祝会上向雷台尔颁发了友谊勋章。1月7日，雷台尔从北京出发，乘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和莫斯科，于1月17日抵达柏林，自1月19日起恢复了在魏玛建筑工程学院的工作^[17]。

4 雷台尔在华讲学工作的主要内容

4.1 对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学科建设的指导

1957年雷台尔正式在同济大学工作的时间是6月2日^[16]，“当时学期已过大半，离休假时间不到1个月（按规定外国专家应自7月1日起休假），且教师也将陆续出发生产实习，因此当时不便组织专家开课”，雷台尔主要向中国城市规划同行介绍了德国城市规划和建筑学教育的有关情况，“并为上海市规划局作了一些指导”^[18]。据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保存的档案，1957年7月11日，同济大学建筑系举行专业培养及教学计划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冯纪忠、黄作燊、金经昌、李德华和邓述平等老师。雷台尔在会上介绍了德国魏玛大学和德累斯顿大学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专业教育发展历程，他强调理论要用于实际，“有必要成立研究所与大学衔接，研究理论及把理论用于实际。研究的最终目的必须是

实际”。他认为城市规划与社会科学有密切的关系，如政治经济学是城市规划专业教学的一门重要课程，而开展城市规划首先要做区域规划，专业培养最重要的是基础知识与各专业课之间的搭配与渗透。雷台尔的有关意见，“从国际经验介绍、教学和学制建议和现代规划思想实践等多方面都对刚成立不久的同济规划教育产生了启发，并反映在了教学思想当中”^[22]。

4.2 专门授课之一：“欧洲城市建设史”

1957年下半年，雷台尔在同济大学开设了2门课，其中之一为“欧洲城市建设史”。该课每周1次，每次3个多小时，由精通德语和专业词汇的金经昌亲自担任翻译，其即席口译既流利又专业，使所有听讲者都感到如同金先生亲自在授课^[23]。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组对雷台尔的讲学极为重视，由专人负责记录，后将讲义整理编印成册（其中插图单独成册）。雷台尔在1957年援华总结中，曾解释该课程教学目的是“根据经验研究，特别是欧洲城市建设历史在不同文化阶段的研究，尝试发展一种城市建设历史的方法论，进而指出与中国城市建设的交叉关系并开展系统化研究，为城市规划设计和规划实践提供必要的支持”^[16]。

笔者收藏的《欧洲城市建设史》讲

义，扉页中记载由黄富厢记录、邓述平校对，雷台尔共讲了11讲。除了第一讲的概论、历史分期、地区划分和城市分类之外，第二讲至第九讲主要是古代时期欧洲的城市建设史，从古埃及城市谈起，在对古希腊城市和古罗马城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中世纪德国的城市建设进行了重点讨论，并专门讨论了法国巴黎的古典城市规划。《欧洲城市建设史》的主体内容是古代部分，只有第十讲对近代时期的城市建设进行讨论，最后一讲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城市建设进行了简要分析，并进行了课程总结（表1）。

在概述部分，雷台尔指明了城市建设史研究的性质，即“要研究城市史如何由一个时期发展到另一个时期，城市平面怎样形成、发展及变迁，受什么因素支配，对生活有何影响”；历史研究旨在为现实所服务，“做新的规划必须研究过去城市的发展变迁规律，作为今后发展方向借鉴。由发展上看，新的必然要由旧的发展演变而来”。他指出城市建设史研究要特别注意三个问题，“一、科学地研究和认识城市的结构和特性；二、找出各地区各文化时期的特点；三、用科学的论证说明今后城市要如何做”^[24]。在各讲中，雷台尔的授课即遵照这样的指导思想而展开，首先结合对城市平面及布局形态的介绍，解析其土地使用和

表1 德国专家雷台尔讲授“欧洲城市建设史”的主要内容

Tab.1 Main content of German expert Räder's lecture on "The History of Urban Construction in Europe"

讲次	讲授内容	讲义页数
第一讲	概论；文化时期及地区的划分；城市的分类	9
第二讲	古埃及的城市；Assur 古希腊的不规则城市；Thera 与雅典	7
第三讲	古希腊的不规则城市；Pergamon；古希腊的规则城市；Milet, Knidos, Selinunt 及 Priene	7
第四讲	Etrusker 城市概述；古罗马城市：Aosta, Tingad, Ochsenfert, Pompeji 及罗马	8
第五讲	中世纪德国的城市	7
第六讲	中世纪德国的城市：市场城市（街道城市）及结构——建筑的城市	7
第七讲	中世纪德国的城市：理想的城市	6
第八讲	巴黎：法国的古典城市规划	6
第九讲	理想城市对德国城市的影响	6
第十讲	近代的城市建设	7
第十一讲	战后年代的城市建设；总结	5

注：原稿中部分外文未作翻译，本表按原文录入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4]



图3 雷台尔指导同济大学师生修改城市规划设计方案（金经昌摄，1958）

Fig.3 Räder was instructing Tongji University faculty and students on modifying an urban planning design scheme (Photo by Jin Jingchang, 1958)
资料来源：金华提供



图4 同济大学有关学生、进修同志及相关单位给雷台尔的感谢信（1958年12月）

Fig.4 Letters of thanks from Tongji University students, fellow trainees, and related institutions to Räder (December 1958)

注：上面两排图片分别是城市规划专业（第一排）和城市建设与经营专业（第二排）四年级学生给雷台尔（左）及魏玛建筑工程学院城市规划四年级学生（右）的感谢信；第三排是在同济大学进修的同志（左）和安徽省建筑厅设计院（右）给雷台尔的感谢信
资料来源：德国魏玛大学档案馆

功能设施的安排，剖析其城市空间结构特征，进而分析各个时期的发展演化特点及背后的驱动因素，最后再结合现实工作进行优缺点的评析。

4.3 专门授课之二：“城市规划原理”

“城市规划原理”是雷台尔在同济大学讲授的另一门重要课程。在1957年援华总结中，雷台尔说明该课程教学“试图通过城市功能来阐明当代城市建设实践和理论中的问题。尤其应考虑到中国城市发展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化发展而产生的特殊性”，“讨论了城市的社会学、经济、技术和城市建设要素，城市结构和规划方法的问题，城市划分和城市形态的发展。此外，还讨论了城市住房问题以及城市交通功能”^[16]。

很遗憾笔者未能搜集到“城市规划原理”课程的文字版讲义，只能通过该讲义的插图册（图5）对其授课内容有所管窥，这些插图即雷台尔讲课时播放的幻灯片。由插图编号可知，雷台尔共讲了12讲，插图册始于第3讲（前两讲可能是纯理论，未配插图）。在第3讲中，雷台尔首先分析了德国中东部城市萨尔费尔德（Saalfeld）的现状（3-1^⑤）和区域规划（3-2），展示了魏玛这座城市在1840年和1941年的平面图（3-7、3-8），接着播放上海市中心的航空照片（3-9），继而结合图解从理论上分析了居住与工作的关系（3-11）、城市的功能（3-12）、城市居住地点与工作地点间的往复交通（3-13）、城市及城市周围地区的范围（3-14）、城市和城市周围地区的组成（3-15），后又展示了一个1948年的柏林规划方案（3-17）。

在其后的几讲中，雷台尔的授课方式也大抵如此，其幻灯片插图既包括一些理论性、原理性的图解，也包括世界上一些典型城市的现状图、规划图、城市空间发展演变图以及实景照片等。前者包括理想城市、细胞形城市、环形城市、卫星城市、带形城市等新兴规划理念或规划模式，后者包括伦敦、纽约、巴黎、柏林、莫斯科、高尔基、斯大林格勒、斯德哥尔摩、维也纳、昌迪加尔和马德里等，其中不乏对多种不同方案、规划模式的比较分析，也不时插入一些中国本土的案例，如上海的工人新村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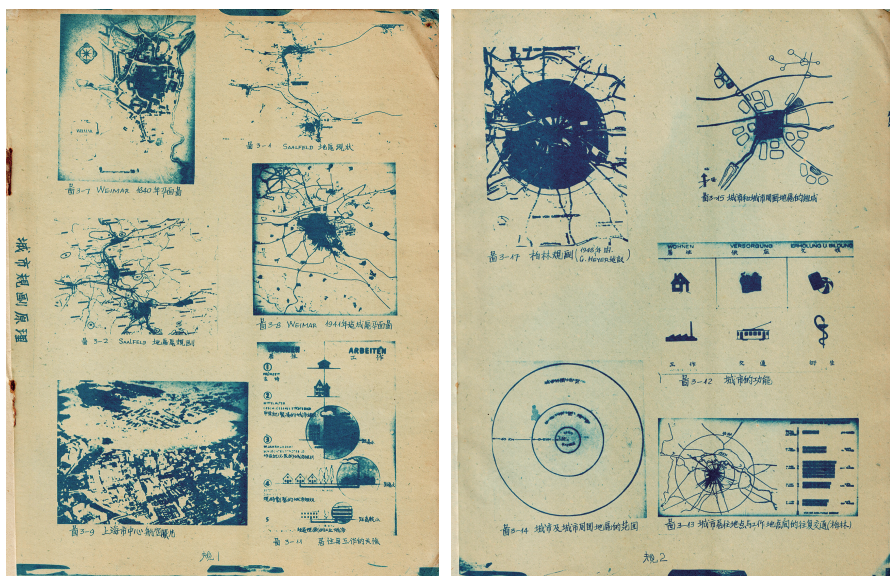


图5 雷台尔“城市规划原理”讲义插图册的正文前两页（第三讲插图）
Fig.5 The first two pages of the main text of Räder's "Principles of Urban Planning" lecture notes (Lecture 3 illustrations).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5]

布和北京的航空照片等。雷台尔对世界各国的住宅规划建设相当重视，对城市居住单位的合理组成、街坊设计、住宅建筑布置、提高层数和节约用地的关系、根据步行距离要求而规划的城市均有讲解，并专门介绍了邻里单位概念及英国哈罗新城的划分方式等。对于当时正专注于学习苏联城市规划的中国规划人员而言，这些内容无疑是十分新颖的，极大开阔了规划人员的视野和眼界。

雷台尔来华之初，曾于1957年6月25日在同济大学建筑系作过一个题为《城市规划与交通问题》的专题报告，后刊载于1958年《同济大学学报》^⑥，其中的一些观点可以为《城市规划原理》的认识提供补充。雷台尔指出：“城市规划是处理城市空间的科学，城市规划就是要为城市所有居民按照社会主义的观点在三度空间中处理其生活问题。”他又指出：“城市应该使居民在文化及思想上不断的发展，为艺术、文化及科学的繁荣创造条件，使其发展更加完善。”雷台尔认为：“社会的因素和经济的因素应该作为城市规划的基础。”同时他也认为：“城市的组织应该像人体一样完善，在活动中相互没有障碍，这种像人体一样的有机组织方法是今日城市规划的方法。”^[26]

关于城市交通，雷台尔特别强调了

与城市规划统筹研究的思想：“解决城市交通及道路系统问题，尽管在交通规划本身看来很完整，但是不与城市规划取得配合还是不全面的。尤其是在专业范围内的专家常常会只注意到自己专业范围以内的内容，而忽视了交通与城市规划的关系。要解决交通问题，专业工程师应该认识什么是城市，了解什么是城市规划。”雷台尔认为：“城市交通犹如人体的血管及神经系统，交通系统是城市有机组成的一部分。”他同时认为：“合理的城市不应该被交通所统治；相反地，交通应该为城市服务。”在报告中，雷台尔就城市的各项功能组织与联系、城市交通发展规律、不同交通方式相互配合、道路系统分类等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最后还特别强调：“不论在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在资本主义国家，交通问题在城市中还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26]

4.4 讲学交流的其他方面：对上海、江西和合肥等地城市规划工作的指导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教育强调“真刀真枪”，主张“教学为社会服务，教学与规划实践相结合”，常常将实际规划项目作为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的选题，并有较多的实习机会，这使得雷台尔在受聘同济大学期间也接触到大量的实际项目，并常常到各地实地调研和学术考

察，对不少城市的规划工作进行过指导。

1957年首次访华时，雷台尔指导过的一个代表性规划项目是上海市大连西路实验小区规划。该项目于1957年冬季由上海市规划勘测设计院与同济大学合作，参加人员包括钟耀华、金经昌、冯纪忠、李德华、邓述平和方润秋等，规划设计方案的特点是密切结合规划用地的水网地形、重视住宅朝向，建筑布局有机结合，强调人、车交通分流的枝状道路系统，并以步行道连接住宅及生活服务性建筑^[27]，是因地制宜改进居住区规划模式的有益探索。

1958年第二次访华时，雷台尔从广州直接到江西省，在南昌和景德镇等地视察和指导同济大学师生搞快速规划^[27]。对于当时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师生完成的一大批粗线条的城镇总体规划方案，雷台尔“感到意外惊喜而倍加赞赏”^[27]。其间，同济大学教师董鉴泓、李铮生和潘百顺正带领城市建设与经营专业三年级学生协助安徽省合肥市做规划。得知雷台尔已再次来华的消息，董鉴泓即与合肥市规划部门领导陈衡商议，邀请雷台尔前来指导规划。随后董鉴泓即赶去江西，征得金经昌和雷台尔的同意，陪同他们经九江和芜湖来到合肥。1958年10月，雷台尔在对合肥进行实地踏勘的基础上，与金经昌一起，“在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上，用彩色笔作了几个示意方案，又与陈衡及[合肥市]规划院的人员一起讨论，后来归纳了一个方案向市领导汇报，由金先生翻译”^[28]。由雷台尔主导完成的合肥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空间布局呈扇形结构，虽然规划方案是粗线条的，但主题十分明确，即利用巢湖的季风，将绿地（包括农田）从三个方向楔入城市，并连接合肥老城区原护城河形成绿环（图6），“这个方案与苏式的及当时国内主流派的规划完全不同”^[11]。雷台尔在合肥城市规划座谈会上介绍这一规划方案时指出，“（发展）现代化工业，应把生产和生活安排得很好，不然就会产生很多矛盾”^[29]。合肥市后来曾多次修订城市总体规划，但这一扇形形的布局基本上坚持下来，使合肥市成为国内少有的生态环境良好的城市之一^[30]。

5 雷台尔来华讲学对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影响

5.1 深刻影响了以董鉴泓、阮仪三和耿毓修为代表的一批城市规划学者的学术发展方向

雷台尔在同济大学讲学期间，听课的不仅包括本校的学生和教师，还包括上海市规划勘测设计院的规划人员，以及国内一些高校派来进修的教师，如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赵长庚、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的黄伟康、天津大学建筑系的魏抱礼等^[22]。同时，雷台尔讲课的讲义也作了专门编辑和印刷，为其他人阅读学习提供了可能。雷台尔的讲学对许多规划人员的学术发展方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以董鉴泓为例，正是受到雷台尔的热情鼓励，他自1959年开始编写《中国城市建设史》教材，1961年9月完成初稿并开始在同济大学开设“中国城市建设史”课程，经过多年持续不断的实地调查和补充完善，于1982年12月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国城市建设史》一书，作为高等学校试用教材向全国发行，1989年、2004年和2020年又出版了第2、第3和第4版，成为我国城市规划专业最基础、最核心的教材之一，并在国内外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31]。鲜为人知的是，除了《中国城市建设史》之外，董鉴泓还主持编写过《外国城市建设史》教材，于1963年11月完成初稿，1964年和1981年进行过2次大的修订。正是由于这些开拓性努力，董鉴泓被公认为我国城市规划史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受董鉴泓的邀请，阮仪三是《中国城市建设史》教材编写工作的参与者。对阮仪三而言，雷台尔的讲学不仅给他带来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观念，还赋予他进行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的强烈意识。雷台尔不仅关注欧洲城市的历史文化保护，对中国城市的历史文化也备感兴趣，他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教师一起研讨过“平江图”的各个局部，对苏州古城和运河进行过实地考察，还特意购买了宋代“平江图”碑刻拓片，并悬挂在位于上海衡山饭店的寓所之中（图7）^[32]。在魏玛大学档案馆的雷台尔

档案中，还保存有雷台尔对中国古城西安的空间结构所做的历史文化笔记（图8）^[3]。

阮仪三认为，雷台尔在“欧洲城市建设史”课程上有两条主线，一条线讲新城发展，另一条线讲古城复兴，“德国学者雷台尔的保护古城另建新城的城市化建筑规划模式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33]。“德国专家带来的先进的西方思想，启发了阮仪三。这种把过去、现在与未来完美地织成一体的情景，让他有一种全新的感动……为他打开了古城保护的第一道门”^[34]。阮仪三坦言：“1980年我们做了平遥古城的保护规划，这种新旧分开保护古城的方案，就是从欧洲古城保护的中学来的。”^[35]阮仪三因“刀下救平遥”“以死保周庄”等诸多历史文化保护的功绩而被誉为“古城卫士”，并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36]。

此外，雷台尔的讲学对其他不少同济学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以1957年考入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耿毓修为例，他曾回忆，“我记得入学专业教育第一课是由德国专家雷台尔上的。他形象地讲，城市规划犹如交响乐队的指挥。一首交响乐需要各种弦乐器、管乐器、打击乐器配合演奏，要靠一位乐队指挥的指导才得以完成。一座城市的建设同样如此，各种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建设工程如何合理安排，就需要城市规划师的运筹。因此，城市规划师要掌握多学科的知识并融会贯通”^[37]。正是受到雷台尔有关学术思想的影响，耿毓修对城市规划管理产生极大兴趣，并最终走上城市规划管理的道路，他曾担任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总工程师等重要职务，并撰写出版《城市规划行政与法制》《城市规划管理与法规》《城市规划实施》《城市规划管理》等多部著作，成为中国城市规划管理领域的重要开拓者和知名专家。

5.2 为中国城市规划学科注入浓厚的“历史”与“理论”的文化基因，并打开了一扇面向国际城市规划的重要窗口

同济大学是中国城市规划教育的最高平台之一，对全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性、示范性和带动性。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同济大学已经

汇聚了金经昌、钟耀华、李德华、董鉴泓等全国最雄厚的城市规划教育力量，加之采取专门设置城市规划专业的独特办学模式，到1957年时已呈欣欣向荣的蓬勃发展之势。在此情况下，1957—1958年德国专家雷台尔的讲学，使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教学力量更上一个台阶，并与金经昌等教授的学术专长形成良好的互补与支撑，可谓如鱼得水、如虎添翼。

雷台尔讲授的两门课程“欧洲城市建设史”和“城市规划原理”，分别以“历史”和“理论”为思想精髓，它们是城市规划这门学科最基础、最重要、最关键的两大支柱。正是受到雷台尔所带来的思想的启迪和深刻影响，同济大学在城市规划办学的早期即已形成了极为重视历史与理论的独特文化传统。一方面，由董鉴泓先生开创的中国城市建设史研究及多版全国统编教材《中国城市建设史》，是这一文化传统得以传承的一个重大成果。另一方面，由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教师集体编写、1960年6月铅印出版的《城乡规划原理》，以及自1981年起先后由李德华和吴志强主编的多版全国统编教材《城市规划原理》，则是这一文化传统延续发展的另一重大成果，仅仅从其书名“城市规划原理”即可追踪到雷台尔学术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痕迹。

从1950年代的国际形势来看，尽管东德也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同样也要学习苏联经验，但在城市规划学科和城市规



图6 雷台尔提出的合肥城市规划方案（1958年）

Fig.6 Hefei urban plan proposed by Räder (1958)
注：合肥市规划局收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9]



图7 雷台尔特意与寓所中悬挂的“平江图”碑刻拓片作同框合影（金经昌摄，1957年）
Fig.7 Räder specially took a photo with the rubbing of the "Pingjiang Map" stele hanging in his residence (Photo by Jin Jingchang, 1957)
资料来源：金华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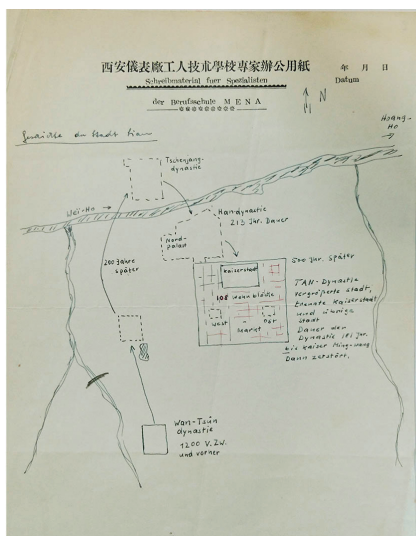


图8 雷台尔所作关于中国古城西安的历史笔记

Fig.8 Räder's historical notes on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of Xi'an
注：德国魏玛大学档案馆收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9]

苏联模式的文化传统和城市规划工作方法^[38]。正是经由雷台尔介绍输入的东德城市规划文化传统，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科在1950年代全国学习苏联的时代背景下，不只局限于单一的苏联经验，而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并以历史与理论的基石形成推动自我革新与发展的强大内核。可以说，这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科之所以能够长期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彰显了东德专家雷台尔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学科的现代化奠基阶段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和深远影响。

5.3 对不少重点城市的规划实践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为中国创造出现代城市规划的“合肥模式”

1983年，吴良镛在分析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结构时，针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城市规划发展，特别总结提出了“合肥方式”和“洛阳方式”，他认为合肥老城的城墙虽已拆除，但护城河一带建设成环城绿地，成为该城“美丽的项链”，新区分三片在城外呈翼状发展，“新区绿地与城市交错，避免了一般‘大饼式’形态，可取得良好的环境效益”^[39]。城市规划布局结构的“合肥方式”又称“合肥模式”，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等许多权威文献中，均将其作为典型案例进行重点分析和讨论^[40]。如果说“洛阳模式”是一种在重点工业项目联合选厂过程中由各种现实因素影响所促成的自然发展的结果^[41]，那么，“合肥模式”则显然是由城市规划师特定规划思想主导下的一种能动性的设计和创造，明确体现出城市规划工作者的独特价值与作用，而它正是东德专家雷台尔所留给我们的规划遗产。

6 几点思考与启示

6.1 城市规划专家国外讲学的双重影响机制

如上所述，东德专家雷台尔在中国的讲学和交流活动，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城市规划学人、城市规划学科和城市规划实践。不仅如此，这些学术交流活动反过来也对雷台尔本人的学术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来华之前，雷台尔已经认识到城市规划学科应该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同济大学讲学时，他积极向中国同行宣传他的这一观点，并特别建议“有必要成立研究所与大学衔接”；而在中国的实际工作中，尤其是看到由于面向城市规划实践而采取“真刀真枪”的规划教学模式所产生的各种丰硕成果时，更加坚定了他的这一思想主张。在完成中国的讲学任务返回东德后，雷台尔撰写发表了《论我们城市的社会主义转型》和《高校在城市社会主义转型中的合作》等多篇批判性文章^[42-44]，特别强调“高校在推进社会主义转型相关教学研究时，若能与实践紧

密结合，理应获得更多城市层面的支持与配合”^[45]，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之行带给他的重要历史印记。此外，在结束中国之行的前夕，中国同行还曾专门赠送给他大量有关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资料和文献，他也多次向东德的同行介绍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有关情况，成为中德城市规划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曾经参与新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经历，也使雷台尔成为世界上极少数拥有在东方社会主义大国进行规划实践经验的知名专家，这无疑提升了他在国际学术圈内的声望。

这些情况充分说明，赴中国讲学的这一特殊经历，对于国外专家而言也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从国外专家的视角，新中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规划实验场”，这里有着坚定的政府意志、集中的资源、大规模且快速的建设需求，这让他们能在纯粹且极致的条件下，检验其规划理论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而中国复杂的国情和特殊的现实条件也暴露了某些城市规划理论的局限性，迫使国外专家去思考理论的边界和适应性，从而推动其学术思想的深化、淬炼和升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外城市规划专家的讲学和交流，并非简单的单向知识传输，而是一个典型的“双向赋能”过程，呈现出一种双重的、交互式的影响机制。

6.2 城市规划跨国知识转移的重大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学习苏联城市规划经验的时代背景下，东德城市规划专家雷台尔在同济大学的讲学及相关规划实践活动，可谓一朵盛开的奇葩。雷台尔的案例，生动展现了城市规划学者开展城市规划国际学术交流和城市规划知识跨国转移活动的独特魅力与重大意义。仅仅雷台尔这一位国外专家，仅仅为期一年的讲学活动，就对同济大学的城市规划教育和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产生了多个方面的重大影响。通过这一案例，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推动城市规划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和国际合作，正是提升城市规划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城市规划人才的重要手段和关键途径。今天，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城市规划学科的不断发展和中国城市规划也正在逐步走向海外，中国城市规划学者的对外交流、对外讲学和技术

援助必将在传播城市规划思想、发出中国规划者的声音和促进全球城乡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展现新的作为,谱写新的篇章。

6.3 关于新中国早期城市规划理论“源流”的再认识

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规划工作而言,尽管当时的城市规划实践主要受到苏联城市规划理论的突出影响,但在这一主导潮流之下,还有波兰、东德、捷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众多其他国家的城市规划理论思想,也曾在中国传播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和若干规划遗产。因而,应当重新审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城市规划知识流动,打破将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思想来源单一化为“苏联模式”的刻板印象,认识到其背后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多元城市规划技术思想的交流与汇合。当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技术交流中,苏联的影响是主导性的,而其他东欧国家的影响则呈现出多元补充的特点。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在吸收外来经验的同时,不断进行本土化转化与创新的过程,其源头是多元的,其发展是动态的。学习历史上“吸收、融合、创新”的成功经验,对于今天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既保持文化自信又博采众长,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划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正是城市规划史研究亟待拓展和深化的新领域。

6.4 特殊时代条件下城市规划工作者的“盲从”

雷台尔1958年9月第二次来华时,正值中国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阶段。当时的城市规划工作在“多快好省”思想影响下开展了大量粗线条的快速规划和农村人民公社规划等,这些规划“跃进”的实践虽然在解放思想和规划创新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历史已经证明其实践成效甚微,更多地表现出“空想”的性质。在中国的这场规划“跃进”运动中,雷台尔作为一名外国专家,其立场和表现值得特别关注。由于其“局外人”的身份,雷台尔本来可以更清醒、更理性地审视中国的规划“跃进”,发挥其担当

“观察员”的监督作用,但从他的言行表现来看,几乎与中国当时绝大多数的城市规划工作者一样,充满激情乃至异常亢奋地参与其中。这一方面表明,在经历了1957年第一次来华讲学之后,雷台尔已经深度融入中国的城市规划界,并且对中国饱含深厚感情,从而像一家人一样参与中国的规划运动。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说,面对特殊的政治运动他也表现出一定的狂热与“盲从”,缺乏一名学者应有的技术理性。当然,作出这样的评价或许过于苛刻,因为“大跃进”作为一场全民性的政治运动,形成了“势不可当”的洪流,个人的理性思考很容易被群体的激情所淹没,而保持沉默或提出不同意见也会面临被批判或边缘化的压力。同时,国外专家对中国的援助也只限于技术层面。因此,我们应当对这种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不得已”持一种理解和同情。但无论如何,雷台尔的案例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城市规划工作者必须培养和保持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在任何环境下都应当勇于立足专业知识和客观条件而发出理性的声音,这是城市规划学科日益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应当时刻铭记的。

感谢张松、李百浩、王雅娟、金华、陈立群和李文墨等专家对本研究的指导和帮助。感谢杨宗彬协助在德国魏玛大学档案馆查档,感谢该档案馆工作人员Christiane Wolf的大力支持,感谢Ines Weizman和Johannes-Christian Warda在资料搜集方面提供的帮助。感谢刘艾琳协助德文翻译和校对。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

注释

- ① 这一专业名称主要依据同济大学1953年首届规划专业毕业生张友良和包海涵的成绩单,以及金经昌1952年日记。这是一个重要话题,但并非本文重点,拟另外撰文讨论。
- ② 在金经昌于1968年5月30日亲笔所写“文革”交代材料《关于我对城规专业和教研室所产生的恶劣影响问题的交代(提纲)》中,曾对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科建设的一些重要事件进行过专门回顾,共14条内容,其中第11条是:“雷台尔来我校

后,更把修正主义城市规划的理论完备起来。我过去学的一套和他的相似,因此帮助他宣扬了这一套错误的规划理论。”金华提供。

- ③ 雷台尔在同济大学讲课时曾讲道“结构——建筑平面:一个例子是我的故乡Nördlingen城,教堂为‘Dominant’,各条均对准它建造,并逐步发展……”(《欧洲城市建设史》讲义,第“1-8”页)。诺德林根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西南部,以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城墙和独特的陨石坑地貌著称,而纽伦堡位于该州东南部,是中世纪德意志皇帝的重要居住地,以玩具制造和工业闻名,两地相距约200 km。
- ④ 另据迪吉波特拉数字肖像档案馆资料,雷台尔逝世于1984年11月,其资料来源为德国国家图书馆。详见:<http://www.digiporta.net/index.php?id=270974189>。
- ⑤ 括号内的代码是《城市规划原理》插图册中的图片编号。为避免与本文图片编号产生混淆,特将插图册原稿中编号前的“图”字全部略去。下同。
- ⑥ 该文末尾注有“本文系1957年6月25日专家在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所作学术演讲,由金经昌教授口译”,“何德铭、李锡然、黄富顺、邓述平记录整理”。感谢李百浩教授提供这一文件。

参考文献

- [1] 吴志强.论同济规划之精神:对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责任与贡献[J].城市规划学刊,2024(7):2-6.
- [2] 吴志强,周俭,彭震伟,等.同济百年规划教育的探索与创新[J].城市规划学刊,2022(4):21-27.
- [3] 吴志强,杨婷.同济规划设计教育的早期发展[J].城市规划学刊,2019(3):11-19.
- [4] 董鉴泓,吴志强.50年艰辛创业,新世纪再创辉煌:贺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成立50周年[J].城市规划汇刊,2002(3):1.
- [5]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四十五年精粹: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纪念专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
- [6] 侯丽.同济详规教研室两三事:邓述平先生访谈[J].城市规划学刊,2016(5):130-131.
- [7] 本刊编辑部.纪念金经昌先生诞辰100周年暨逝世10周年笔谈[J].城市规划学刊,2010(6):1-5.
- [8] 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与同济城市规划[J].城市规划学刊,2012(6):129-130.
- [9] ZHANG Qi. Urban preservation in Chi-

- na: the survival of an idea despite political repression, 1950—1982[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2017.
- [10] 李浩.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教育之管窥: 以同济大学规划专业名称的考辨为中心[J]. 北京规划建设, 2023(6): 171—176.
- [11] 董鉴泓. 1950年代“学习苏联”影响下的同济规划[J]. 城市规划学刊, 2013(5): 127—128.
- [12] 刘亦师. 铁幕·竹幕: 新中国早期国际建筑交流述略(1949—1978年)[J]. 建筑史学刊, 2024, 5(4): 159—172.
- [13]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金经昌纪念文集[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 [14] 中国建筑学会, 《建筑学报》杂志社. 中国建筑学会六十年[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
- [15] BARTH H, TOPFSTEDT T. Vom Baukünstler zum Komplexprojektanten: architekten in der DDR—Dokumentation eines IRS—Sammlungsbestandes biographischer Daten[M]. Berlin: Institut für Regionalentwicklung und Strukturplanung (IRS), 2000.
- [16] RÄDER H. An das ministerium für Hochschulwese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A]. Weimar: Archiv der Bauhaus—Universität Weimar, Nachlass Hermann Räder, 1958.
- [17] RÄDER H. Bericht über den 2. Teil meines Arbeitseinsatzes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Abreise am 26.7.1958—17.1.1959 [A]. Weimar: Archiv der Bauhaus—Universität Weimar, Nachlass Hermann Räder, 1959.
- [18] 同济大学. 向高等教育部工业教育司的请示报告[A]. 同济大学档案馆, 1957.
-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 致同济大学、清华大学的回函[A]. 德国魏玛大学档案馆, 雷台尔档案, 1957.
- [20] 冯纪忠. 致雷台尔的感谢信[A]. 德国魏玛大学档案馆, 雷台尔档案, 1957.
- [21] 同济大学. 致雷台尔的感谢信[A]. 德国魏玛大学档案馆, 雷台尔档案, 1959.
- [22] 杨婷.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育思想发展史研究[D]. 上海: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018.
- [23] 黄伟康. 深切缅怀金经昌教授[J]. 城市规划汇刊, 2000(2): 5.
- [24] 雷台尔. 欧洲城市建设史[R]. 上海: 同济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教研组编印, 1957.
- [25] 雷台尔. 城市规划原理(插图)[R]. 上海: 同济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教研组编印, 1957.
- [26] 雷台尔. 城市规划与交通问题[J]. 上海: 同济大学学报, 1958(1): 21—28.
- [27] 宗林. 1958年同济城市规划专业师生在江西搞快速规划的回忆[J]. 城市规划学刊, 2016(1): 127.
- [28] 方运德. 忆合肥50年代的一次规划[M]//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四十五年精粹: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纪念专集.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7.
- [29] 宋敏. 从“扇叶城市”到“紧凑城市”[D]. 南京: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2017.
- [30] 董鉴泓. 陈衡与合肥市城市规划[J]. 城市规划汇刊, 1996(6): 63.
- [31] 李浩. 城·事·人: 城市规划前辈访谈录: 第五辑[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7.
- [32] 金华. “业余”身份的专业眼光: 记金石声六十余年的京杭运河拍摄[J]. 中国摄影, 2022(10): 20—35.
- [33] 汪颖. 阮仪三: 用建设“美丽乡村”来寻回乡愁, 是哀其不存的心痛[J]. 中国民族建筑, 2017(7): 57—67.
- [34] 丁七玲. 古城卫士: 阮仪三传[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3.
- [35] 阮仪三. 古城笔记(插图典藏本)[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24.
- [36] 李浩.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制度建立过程及思想渊源的历史考察: 兼谈关于名城制度提出者之惑[J]. 建筑师, 2023(1): 112—122.
- [37] 耿毓修. 我国城市规划专业的前沿基地[M]//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四十五年精粹: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纪念专集.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7.
- [38] 李浩. 北京城市规划(1949—1960年)[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2.
- [39] 吴良镛. 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结构、旧城更新与城市设计[J]. 城市规划, 1983(6): 2—12.
- [40]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 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41] 李浩. “梁陈方案”与“洛阳模式”: 新旧城规划模式的对比分析与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5(3): 106—116.
- [42] RÄDER H. Zur sozialistischen Umgestaltung unserer Städte[J]. Wissenschaftliche Zeitschrift, 1962, 9(4): 341—349.
- [43] RÄDER H. Zur sozialistischen Umgestaltung unserer Städte[J]. Wissenschaftliche Zeitschrift, 1962, 9(5): 389—406.
- [44] RÄDER H. Die Mitarbeit der Hochschule bei der sozialistischen Umgestaltung unserer Städte[J]. Deutsche Architektur, 1963, 12(8): 472—473.
- [45] KLEMSTEIN F. Denkmalpflege zwischen system und gesellschaft: vielfalt denkmalpflegerischer Prozesse in der DDR (1952—1975) [M].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21.

修回: 2025-12